

彭家煌

小说选







彭家煌小说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长沙







目 录

序言	王 述 (1)
出路	(1)
平淡的事	(13)
请客	(24)
Dismeryer先生	(32)
我们的犯罪	(42)
喜讯	(50)
今昔	(60)
奔丧	(70)
在潮神庙	(88)
美的戏剧	(110)
牧童的过失	(118)
怂恿	(130)
活鬼	(151)
节妇	(162)
晚餐	(178)

贼	(190)
垃圾	(204)
莫校长	(231)
国货	(241)

【附录】

彭家煌的《喜讯》	茅 盾 (250)
----------------	-----------



序 言

王 述

在“五四”革命浪潮激荡下觉醒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从这充满痛苦与灾难的时代里，感到苦闷与窒息，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忧心与不安，他们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继承“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发扬“五四”文学的传统，参加到日益扩大的文学行列中来，用作品揭露社会的黑暗，谴责社会的罪恶。这一批青年作家当中，有我们所熟悉的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也有彭家煌。

在文学创作成就上，那些作家各有各的战绩；但是历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家和文学史家，对于彭家煌这位当时活跃于文坛的作家，似乎是过于的怠慢了。在历来的研究著作和文学史著作中就很少谈到他。把他的成就从大家的遗忘中重新发掘出来，看来并非多余的事。

彭家煌（1900—1933）正是在1927年，这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开始文学创作的。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短短的不足七年的创作生活中，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七十余篇，坚持进步的创作实践。

彭家煌的作品，多直接取材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以短小的篇幅展示社会生活的一角。困顿不安的城

市，贫瘠衰败的农村，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民，以及他们被苦难所折磨的近于麻木的精神状态。这些画面共同构成了1927年前后新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面貌。彭家煌所写的，都直接来自他所目击着的生活现实。

反对封建迷信，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是“五四”新文化的主要内容。彭家煌继承这一光荣传统，因而，暴露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宗法制度以及封建道德礼教的弊害，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活鬼》、《节妇》等篇，都是通过畸形的婚姻，揭示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戕害。小说中荷生的祖父替十三、四岁的荷生娶了个比他大十来岁的媳妇。这个少夫大妻的家庭时常“闹鬼”，荷生不知道这“鬼”是他妻子招来的，特地请来一位自称善于捉鬼的好友咸亲与他们同房，以便驱鬼镇邪。自此，“鬼似已绝迹”，但当咸亲离去后，“鬼”却重来。荷生用猎枪打中竹林中的“鬼影”，当他去向好友报告这一壮举时，咸亲不在，并从此再也不明他的下落。如果说《活鬼》是通过一场闹剧，对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风俗，进行了嘲弄与讽刺，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之中，那么《节妇》则对封建礼教给妇女的迫害，进行了很充分的揭露。

婢女阿银在夫人死后，比她大五十岁的候补道大人对她命运的裁决是“嫁给自己”，“新婚之日便有多似的孩子叫她亲姆”，长孙比她的年龄还大。阿银廿岁时做了寡妇，长男、长孙们以“关怀”为名，把她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见世面，终于她被这一家三代所蹂躏。过去，“阿银没有领教过人生的丰富的滋味，……她是昆虫、动物，可有可无的在这世上占

着空间。“但人毕竟不是昆虫，当阿银也意识到做人的权利时，长孙接到父亲严厉的手谕：“务嘱太婆即日回乡，青年婆妇应守先君坟墓，否则飞短流长，有损家声，贻羞乡里，置我等颜面于何地……”。一切又都归于破灭，她只能“回乡去做节妇了”。

鲁迅先生早就指出这种所谓的“节烈”，乃是几千年“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封建社会传衍下来的“畸形道德”。“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所以他说这“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节妇》正是通过阿银的非人处境与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礼教道德对妇女的摧残，以及它的野蛮与虚伪。

怀着对被压迫受剥削人民的同情，着眼于社会病苦，通过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揭露反动统治强加给人民的苦难，是彭家煌作品的又一重要内容。

《奔丧》、《喜讯》等篇写天灾兵祸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连年的军阀混战，人民不仅遭受着劫掠烧毁之苦，随之而来的瘟疫蔓延，更吞噬着人民的生命。《奔丧》所描写的那个荒凉的山村，人是“一屋一屋的死”，哭声不绝如缕，竹林中秋虫的哀鸣，伴随着荒冢白骨，笼罩着一片阴森鬼气，那人间正是鬼域。

城市下层人民则经受着解雇失业的威胁，他们连出卖劳动力的权利也被剥夺，挣扎苦斗，民不堪命。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驴打滚的高利贷剥削，更把人们推向绝路。女人为生活所迫逼良为娼，男人则铤而走险为盗。《平淡的事》中善良的眼科医生，因为交不起税，连诊所的招牌也不许挂，以

致无人问津，他只能靠典当，忍受着高利贷盘剥，穷愁潦倒无以为生。《出路》则写一个失业工人为生活所迫，准备用一支玩具手枪行劫，未遂终被打死的悲剧。这些小说，为残酷的现实提出了含泪的控诉。

对于蒋介石制造白色恐怖，滥杀无辜，实行法西斯统治，作品也有所反映。《喜讯》中的拔老爹，变卖了田地房舍，忍受着贫困悲楚，唯一的希望是盼着在大城市做事的儿子“发迹”，以便回乡来救他于危难。但他最终盼来的“喜讯”是儿子因“政治嫌疑”，被判处“徒刑十年”。在《我们的犯罪》中，描写了一群借书人的遭遇。一个纯属尽义务办起来的小图书馆，莫名其妙地引起了“党部”的怀疑，于是“派警守候”，凡是前来借书的一律拘捕审查。通过这看似荒唐的丑剧，表现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黑暗现实。

革命到来了，“内骨子却依旧”。新官场仍然是尔虞我诈，昏庸腐败。彭家煌的作品，虽然也揭露所谓“革命军”内部的相互倾轧（《垃圾》），“牛贩子”投机革命，当县署“委员”的作威作福（《今昔》），讽刺把办教育当生意做的所谓教育家的市侩心理（《莫校长》），与无耻文人的丑恶灵魂（《蹊跷》），也有一些篇章对小市民庸俗无聊的生活进行了讥讽与鞭挞（《火灾》、《勃谿》）。但他更多的篇幅则是着重揭露蒋介石的所谓“革命”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灾难，描写的是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反映的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那个愚昧、落后、贫穷、困顿的社会。他的作品从不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作者的艺术勇气是很值得称颂的。

严谨朴实，自然细腻是彭家煌作品的艺术风格。他重视

生活面貌和人物形象的准确勾勒，不事过分的渲染与夸张。观察入微，笔触细致，善于深入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披露善良人民心灵的纯朴，剖析丑恶灵魂的卑污。加以不枝不蔓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丰富生动。短篇小说《Dismeyer先生》中那一对心地善良的夫妇，《美的戏剧》中的“小人物”秋茄子等，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的作品于朴素中见真实，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尤为熟悉农村生活，文字洗练，语言流畅，也是彭家煌作品的特点。几篇熟练地运用地方语言写农村生活的作品，更充满泥土气息。《怂恿》、《陈四爹的牛》、《美的戏剧》、《牧童的过失》等篇，通过具有南方特色的山村景物，独特的风格习惯，以及纯朴善良的劳动人民，构成一幅幅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风俗画。作品诙谐风趣，其中虽寄寓着对于农民愚昧、落后的善意批判，但写来引人入胜，饶有兴味。其中《怂恿》一篇，曾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并誉为是“那一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

情致恬淡静穆是彭家煌作品的又一特色。在他的笔下，没有咆哮的土地，反抗的人流，也没有那“山雨欲来”的斗争风云，更没有金刚怒目式的吼吼，而只是依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冷静地谛视着人生，极平直地叙述着人间的不幸，描画出一幅幅黑云笼罩，充满灾难的生活画面。而其中却又分明地表现出他对人民大众真诚深挚的同情，以及对一切封建传统、反动统治的憎恶，体现出他热爱人民，关心社会，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

彭家煌的某些作品，又弥漫着一种沉郁的色调，人民在生活的漩涡中颠簸沉浮，无力自持，对前途、命运看不到一丝光亮。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愤懑抑郁甚至带有伤感的情绪。在《我们的犯罪》中，当结束了那场莫名其妙的拘禁，无辜的借书人被释放回家时，面对这令人齿冷的现实，我们从字面以外，分明觉察到流露在作者嘴边苦涩的冷笑。《在潮神庙》一篇中，当主人公朋加象逃走一样离开那纷繁、杂乱、龌龊、贫穷的小镇，他不由地向天乞求着：“潮神啊，显显灵，把这块地方冲洗一下吧！把这个世界冲洗一下吧！”这近似呻吟的低语，声音发自内心深处，但是真的也表露了对旧世界的绝望。这种愤懑抑郁的情绪，来自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憎恶，但也看出了他对前途的茫然，他还没有摸索出前进的道路中还会有什么，更没有寻找到能够冲洗、排除这龌龊社会的真正力量的所在。受到这个思想的局限，他的某些作品就不能不打上一定的悲观暗淡的烙印。二十年代末期以来，革命运动在城市是起伏不止的，革命与反动力量进行着生死较量的风云变幻之际，只是描绘着灾难的生活，无告的人民，就不能不使作品的思想力显得软弱一些。

既对黑暗的现实不满，又找不到生活的出路，是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思想状态，彭家煌创作中的这种思想特点，除了个别作品，如短篇小说《Dismeyer先生》中表现了极其朴素的阶级观点；《今昔》中，对贫苦农民在成立农民协会以后精神面貌的变化，有粗略的反映以外，他所着力刻划的是被压迫者的受难形象。与同一时期，先后开始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尤其是以写农村题材著称的作家如沙

汀、叶紫等相较，他的作品积极性就未免逊色，但是他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作品浓厚的乡土气息，却近于沙汀的早期创作。当然，每个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深度以及在创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就各有不同。彭家煌的作品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他却是以广泛的题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当时许多进步作家一样，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剖析与揭露，真实地反映了那个令人诅咒的年代，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

彭家煌于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又名彭介黄，号楫松，多用原名及彭芳草的笔名发表作品。他曾与李石岑共同编辑过《教育杂志》及《民铎杂志》。一九三三年在白色恐怖下，因发表左倾言论，曾以所谓“煽动叛乱罪”被国民党逮捕，不久获释。终因身心遭到摧残于同年逝世。当时，《现代杂志》及《申报·自由谈》都发表过纪念他的文章，茅盾也曾著文评论他的短篇集《喜讯》。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彭家煌是一位“正派、和气、没有夸诞虚伪的人”，“他对于友人、家庭、社会，一样的诚挚。如果友人穷了，他甚至可以当了自己的被子来周济你，但他却从未做过什么困难的请求。”也有人称他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有市民的伤感、骑士的同情的市民”。大家为他生前遭遇而不平，认为“在资本社会组织下，这种高尚而含有普罗列塔性格的人，是露不出头面的。”除此而外，对他的生平可述者甚少，生时寂寂，死后也默默无闻。

彭家煌的作品，结集出版的共有十一种：《怆愿》（一九二七年，开明书店），《茶波里的风波》（一九二八年，现代书

局),《皮克的情书》(一九二八年,现代书局),《管他呢》(一九二八年,北新书局),《平淡的事》(一九二九年,大东书局),《寒夜》(一九三〇年,神州国光社),《厄运》(一九三〇年,神州国光社),《落花曲》(一九三一年,现代书局),《喜讯》(一九三三年,现代书局),《出路》(一九三四年,大东书局),《在潮神庙》(一九三四年,良友图书公司)。本书所收小说是从以上各集中精选出来的。

目前在现代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了已往的文学史著作,由于受着左倾思想的制约,未能全面地研究现代文学中的作家与作品,甚至包括进步的作家也常被遗漏,这就不能准确地反映新文学运动的全貌。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凡在历史上有过影响并留下了自己足迹的作家和作品既然是客观的存在,就应该容纳于论述的范围之内。至于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和评价自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得到不应有的怠慢,却是不应该的。正是出于这种看法,我们编辑了这一本《彭家煌小说选》,倘作为资料的提供而于研究者有所裨益,或竟会引起别的编选者的兴趣而着手搜罗别的被埋没着的作家的作品,只要能得到这类哪怕是微弱的反应,那末便也达到编选本书的目的了。

出 路

达明坚决的从老乡大狗家里悄悄的出走，不去关照任何人一声。他的意思是想乘大狗夫妇不备，就独立生活起来，挣了钱之后，再上他们的门，好使他们瞧得起，否则一去渺然，永留个失踪后的悲惨印象让他们在安静中去歔歔的揣臆。

其实大狗夫妇绝没有薄待他：从他失业以后，看见他东一餐西一宿的惹人厌，索兴把他安插在自己的茅篷里，弄两块板和一捆草在泥炉边搭个临时床，好使他过夜；每顿饭除豆芽白菜外，又特为添一水豆腐；为了开销大，连病倒在床上的孩子的药资都挪用了作柴米钱；他们只当作放出了一笔债，达明一有了职业，这笔债总可收回的。实际上，在这情形下，达明尽可一壁等机会的到来，一壁安然的住下去；然而不，他的内心不知忽然发了什么痴，硬要悄悄的出走。

他逃犯似的急急忙忙从一幢一幢的茅篷旁溜走，生怕大狗夫妇见了，会这样假意的喊道：“这个时候还到什么地方去，达明，午饭快好了呢！”他是素来拙于言谈的，这一来，他就会回答不出一句话，而且也没有一定的计划可以回答的。他会露出忸怩狼狈的丑态，致令他们骂他是发疯，甚至用恶狠狠的慈悲神气把他拖回来，仍旧没骨头似的住下去。所以，他不能不那么慌忙的溜走，一直冲到臭水河边才站住。